

共同富裕视域下 我国老年群体收入差距的调节机制探析

赵 锐 卢式林 毛尚熠*

【摘要】推动老年人实现共同富裕是新发展阶段面临的重要挑战。充分调动家庭、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探索调节老年人收入差距的实践路径,是推动老年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首先从夫妻间的收入共享、家庭成员的收入共享以及与非同住亲属的经济转移等收入再分配方式探讨了通过家庭经济支持调节老年人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其次,从公共养老金制度、政府补贴和社会捐助等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手段探讨政府和社会经济支持调节老年人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最后,从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积累、实施遗属养老金政策、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依靠农村集体经济收入赡养低收入老年人等角度提出调节老年人收入差距的制度创新策略。

【关键词】共同富裕;老年人;收入差距

一、引言

我国已进入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共同富裕被确立为新发展阶段的远景目标。与此同时,最快的老龄化速度,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未富先老成为三大新国情。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67亿人,占总人口的18.9%,其中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2.0亿,占总人口的14.2%^①。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推动老年人实现共同富裕是新发展阶段面临的重要挑战。在推动老年人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收入、财产和公共服务是反映富裕程度的三个重要维度。其中,老年人自己获得的收入反映了其依靠自身能够实现的经济福利水平,决定了其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也影响了其在家庭中的地位。

推动老年人实现共同富裕应当保障人们到老年时期不至于有过大的不平等。而由于城乡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保障制度的多重分割,财富积累的巨大差异,以及少子高龄化趋势下家庭养老支持的弱化,老年人可能面临更大的收入差距。这种收入差距既体现在全体老年群体之间,也体现在城乡差距和性别差距上。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在2018年,按照

* 赵锐,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卢式林,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毛尚熠(通讯作者),广西财经学院金融与保险学院讲师。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我国老年人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形成机理与调节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XRK001)阶段性成果。

① 民政部:《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8月26日。

老年人的收入排序，位居75分位点的老年人收入是25分位点上的18倍。老年人的收入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差距，城镇老年人的人均年收入达到30992元，农村仅为6730元，城镇老年人的收入是农村老年人收入的4.6倍。同时，老年人的收入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距，老年男性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7742元，是老年女性的1.7倍，老年女性的人均年收入仅为10306元^①。

许多文献已经对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持续的关注。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收入差距也随之演变。总体而言，居民收入差距在1978—2008年间处于扩大阶段，2008年后维持高位徘徊^{②③}。也有研究表明，2007—2008年以后，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下降势头^{④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也从2008年最高点的0.491下降到2021年的0.466，表明这期间收入差距略微缩小。一些研究也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镇，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相对较小^{⑥⑦}。而另外的研究则表明老龄化对我国收入不平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⑧。

关于我国老年人收入差距的文献还比较少。已有研究表明，相较全体居民或劳动力年龄人口，我国老年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扩大，高龄老人间的收入差距最为严重^{⑨⑩}。老年人的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上，养老金收入差距贡献了城乡差距的绝大部分^⑪。性别差距也是老年人收入差距的重要特征，年龄越大，收入的性别差距也越大^⑫。这其中，养老金收入的性别差距也极为显著，老年女性更依赖子女或其他亲友的私人转移收入^{⑬⑭}。从老年人收入差距随时间的演变来看，近十年，由于老年人的收入结构发生改变，收入差距开始下降，城乡差距有所缩小^{⑮⑯}。

老年人之间存在更大的收入差距使得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存在极大的差异，这不但带来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差异，也带来了老年人之间的健康不平等，影响了老年群体的养老安排。同时，随着老龄人口规模的增加，老年人之间更大的收入差距也是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体现，而扩大的收入差距以及收入分配问题将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较大的挑战。此外，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强烈，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老年人之间过高的收入差距也不利于消费的增长。因此，在老年人面临过高收入差距的背景下，如何发挥各方面的作

① 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计算所得。

② 李实、朱梦冰：《中国经济转型4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管理世界》2018年第12期。

③ 罗楚亮、李实、岳希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分析（2013—2018）》，《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④ Kanbur, R, Wang, Y, Zhang X. The Great Chinese Inequality Turnaround.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21,49(2).

⑤ Piketty, T, Yang, L, Zucman G. 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 – 201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109(7).

⑥ 曲兆鹏、赵忠：《老龄化对我国农村消费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⑦ 郭继强、陆丽丽、姜丽：《老龄化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世界经济》2014年第3期。

⑧ 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人口老龄化是否加剧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国（1996~2009）的实证研究》，《人口研究》2012年第5期。

⑨ Hanewald K, Jia R, Liu, Z. Why is Inequality Higher among the Old?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1,66.

⑩ 尚进云、Howse K、孙晶晶：《基于广义经济福祉的农村老年家庭收入研究（1988-2018年）》，《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⑪ 黄宗晔、赵晶晶：《如何享有平等的晚年：养老金与老年人的城乡收入差距》，《人口与经济》2022年第2期。

⑫ 张子杨、杨慧：《老年妇女收入双重劣势研究——以1926~1950年出生队列为例》，《人口与发展》2019年第5期。

⑬ Zhao R, Zhao Y. The Gender Pension Gap in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2018,24(2).

⑭ 詹鹏：《我国老年人养老金收入的性别差距》，《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⑮ 夏会珍、王亚柯：《老年人收入结构与收入不平等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⑯ 孙小雁、左学金：《中国城乡老年人收入结构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6期。

用，合理调节老年人的收入差距？是我们在推进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推动老年人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需要认识和应对的重要问题。

当前，家庭支持和政府支持是老年人经济支持的主要来源，家庭和政府调节老年人收入差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基于我国老年人之间收入差距的现实，从家庭、政府和社会经济支持等收入再分配机制方面分析缩小老年人收入差距面临的挑战，提出调节老年人收入差距的制度与政策。在家庭经济支持的作用逐渐减弱，政府和社会支持的作用逐渐增强的养老局面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家庭内部的经济支持、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在调节老年人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的作用，从而找准缩小老年人收入差距的政策发力点，探索出合理调节老年人收入差距的实践路径，推动老年人实现共同富裕。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从夫妻间的收入共享、家庭成员的收入共享以及与非同住亲属经济转移等收入再分配角度探讨了家庭经济支持在调节老年人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机制；第三节从我国养老金制度、政府补贴和社会捐助等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机制探讨了政府和社会经济支持调节老年人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第四节从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积累、实施遗属养老金政策、老年人人力资源开发、依靠农村集体经济收入赡养低收入老年人等角度提出调节老年人收入差距的制度创新策略；第五节对全文做了总结。

二、家庭经济支持与老年人的收入差距

家庭养老是我国老年人传统上的主要养老模式，老年人常常同子女共同生活，老年夫妻之间，以及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能够共享家庭收入。此外，那些没有与老年父母共同居住的子女，往往也会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因此，长期以来，家庭内部的收入再分配，以及与非同住子女之间的经济转移起到了保障老年人生活、调节老年人收入差距的作用。

（一）夫妻收入共享与老年人的收入差距

在传统的家庭分工中，男性主要在外工作，承担了赚取收入的责任，而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照料工作。在实施与就业关联的养老保险制度下，进入老年后，男性更可能获得领取保障水平较高的城镇职工养老金的资格，而更多的女性只能参加待遇较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即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就业，获得了领取城镇职工养老金的资格，但由于她们更早的退休，以及任职期间存在的性别工资差距，会使得退休后养老金水平低于男性。因此，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是导致养老金收入性别差距的基本驱动力，在60岁及以上年龄的老年人中，女性的养老金收入只有男性的一半^①。在农村，由于难以被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老年人，特别是老年男性往往会一直工作直到干不动为止，劳动收入依然是农村老年人的重要收入来源，老年男性相比女性也挣得了更多的劳动收入。因此，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老年女性的收入都要低于男性，这种老年人之间收入的性别差距也是老年人收入差距的重要表现。

由于夫妻之间可以共享收入，老年夫妇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夫妻间的收入共享弥补，从而缩小老年人收入的性别差距。不过，这种夫妻间收入流动在缩小老年人收入性别差距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高收入的老年人中，低收入组的老年人由于收入难以满足自身需要，更需要来自子女的转

^① Zhao R, Zhao Y. The Gender Pension Gap in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2018,24(2).

移^①。另外，由于女性的寿命长于男性，女性也更可能嫁给比自己年长的男性，老年男性更可能先于女性逝世，老年女性在丧偶老人中占据多数。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并没有针对丧偶老人有特别的安排，个人的养老金待遇仅仅和自身的缴费经历相关。在丧偶后，老年女性失去了共享配偶收入的可能，其经济福利很有可能下降。因而，通过老年夫妻间的收入共享来调节收入差距的机制将会在配偶逝世后失效。

（二）家庭成员收入共享与老年人的收入差距

在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往往同成年子女同住，在帮助子女照料孙子女的同时，也共享了子女的收入。在农村，很多老年人会在子女成家后将土地分配给子女耕种，自己无偿为子女的家庭经营活动帮工，缺乏自己赚取收入的机会，而自身的养老金还不足以维持生计。此时，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依赖于共享同住子女的收入，这种家庭内部的收入再分配缩小了老年人的收入差距，同住子女的贡献最大^{②③}。

但家庭内部个人养老和家庭子女养老存在“互补替代”关系，个人靠自己收入养老的责任增强，家庭的作用弱化^④。一方面，由于过去长期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当前新迈入老年的人群，生育子女数量较他们的上一代明显减少。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和经济集聚，越来越多的子辈外出工作。此外，现在人们的生活观念也逐渐改变，成年子女即使与父母生活在同一城市，也会在成年后，或者成家后搬出父母家，独自居住。因此，当前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越来越少，独立居住（和配偶独居或者自己单独居住）的老年人占了大约一半^⑤。在独居的情况下，这些老人也失去了作为同一家庭成员，共享子女收入的机会，通过家庭成员共享收入来缩小收入差距的机制逐渐失去作用。此时，对那些低龄老人，继续工作是维持其生活的重要途径，这也减少了老年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三）私人转移与老年人的收入差距

尽管越来越多的子女离开家乡外出工作，或者在成年后搬出家庭，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独自居住或者仅仅与配偶一起生活，在缺乏子女照料的同时，也无法共享子女的收入。但是，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经济往来依旧频繁，据统计，将近85%的老年人能够得到来自非同住子女的转移支付，同时，有大约一半的老人也会给予非同住子女转移支付^⑥。这种双向的经济转移改善了经济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和子女的经济福利，也缩小了老年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一方面，对于那些有着高额养老金，或者积累了较多财富的老人，在子女遇到资金缺口时，往往能够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而大多数不能被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的老人，定期接受子女的经济支持依然是其获得生活来源的重要方式。

① 贾晗睿、詹鹏、李实：《收入再分配与老年人收入差距》，《中国人口科学》2021年第1期。

② 贾晗睿、詹鹏、李实：《收入再分配与老年人收入差距》，《中国人口科学》2021年第1期。

③ Jia H, Zhan P. Intra-family Income Redistribution and Its Dynamic Changes among the Elderly in China: 2002 - 2018. *China & World Economy*, 2021, 29(5).

④ 穆怀申：《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互补替代”效应：理论与实证》，《人口研究》2022年第1期。

⑤ 赵耀辉、王亚峰、陈欣欣、刘雪媛、汤焯、张涛、侯杜比、梁超、孟琴琴、宋泽、张晓敏、毛尚熠、薄海：《中国健康与养老报告》，2019年5月，<http://charls.pku.edu.cn/wd/yjbg1.htm>。

⑥ 赵耀辉、王亚峰、陈欣欣、刘雪媛、汤焯、张涛、侯杜比、梁超、孟琴琴、宋泽、张晓敏、毛尚熠、薄海：《中国健康与养老报告》，2019年5月，<http://charls.pku.edu.cn/wd/yjbg1.htm>。

三、政府和社会经济支持与老年人的收入差距

尽管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依然是我国老年人获取经济来源的重要方式,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目前,新迈入老年的老人大都只生育了1—2个子女。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子女迁徙到外地,这些迁徙到外地的子女也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因此,依靠子女养老的功能逐渐减弱,政府和社会在老年人的养老安排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从老年人的收入来源来看,来自政府和社会的经济支持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决定老年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一) 养老保险制度发展与老年人的收入差距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起退休制度,职工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就可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按月领取养老金。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改革了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而在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仍然适用之前的制度。新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要求职工和受雇单位共同缴费,制定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采用现收现付制来支付养老金。这个改革降低了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也带来了机关事业单位就业人员和企业职工养老金收入的差异。2015年,为了消除这一不平等的体制,促进两个部门之间就业人员的流动性,政府致力于统一这两个部门的养老保险,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就业人员也缴纳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仅仅覆盖了小部分人口。其他的人,主要包括那些生活在农村,以及城市地区的自雇人群和没有工作的人,由于没有在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就业的经历,无法被其覆盖。

自2009年,针对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险计划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开始实施,覆盖了那些没有被雇佣的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也覆盖了在城镇地区没有工作的人。此后,这两个居民养老保险项目结合成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致力于覆盖无法被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的其他所有人群。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这两个根据就业经历决定养老金收入的养老保险不同,居民养老保险项目对于开始实施时已经年满60岁的老人,无需缴费就可以领取养老金,而未满60岁的人必须先缴费。目前,两个居民养老保险项目覆盖了绝大多数没有被职业养老保险项目覆盖的人,成为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险项目。然而,由于基础养老金水平非常低,缺乏个人账户的积累,目前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仍然较低,在大多数省份,老年人每月只能领取100~200元。

随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养老保险对居民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受到关注。总体上看,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具有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①,但社会保障支出再分配效应的效率较低,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②。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内部,养老保险转移收入具有比较明显的收入再分配作用;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却存在“逆调节”的效应^{③④}。分不同养老保险项目来看,尽管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扩展改善了参保群体内部的收入分配^⑤,但也扩大了全体居民的收入差距,而针对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的实施则改善了收入分配^⑥。此外,推行“新农保”也有效减小了农村的消费不平等程度^⑦。上述研究是针对

① Cai M, Yue X. The Redistributive role of Government Social Security Transfers on Inequality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 62.

② 徐静、蔡萌、岳希明:《政府补贴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③ 郭庆旺、陈志刚、温新新、吕冰洋:《中国政府转移性支出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世界经济》2016年第8期。

④ 王延中、龙玉其、江翠萍、徐强:《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以社会保险为例》,《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

⑤ 李培、刘苓玲:《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扩面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财经研究》2016年第4期。

⑥ 贾洪波:《新农保制度收入再分配效应的一般均衡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14年第1期。

⑦ 周广肃、张玄逸、贾坤、张川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4期。

全体居民的收入分配，强调了社会保障制度在老年人和劳动力年龄人口之间的再分配效应。而针对老年人的研究则表明，养老保险制度扩大了老年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综合考虑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和农村人口，老年人养老金收入的差距高于退休前工作收入的差距^①。而“新农保”的实施，以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升了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对老年人的收入再分配效应^{②③}。

尽管社会保障制度改善了居民的收入分配，但针对老年群体而言，我国建立的这种以“多轨制”为重要特征的养老保险体系，带来了老年人养老金收入的巨大差异^④。尽管政府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力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覆盖，并每年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但相比城镇职工养老金庞大的基数和待遇连年的增长，仍然面临巨大的差距。因此，在老年人的收入越来越依赖养老金的情况下，“多轨制”养老金体系所带来的养老金收入的巨大差异，是老年人收入差距产生的重要来源^⑤。

（二）政府转移支付与老年人的收入差距

高龄老人是社会保障政策关心的重要对象，由于年龄和健康的限制，他们几乎不再参加劳动，无法通过自己的劳动赚取收入，这时，养老金收入尤其重要。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之前，由于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壁垒，非农部门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因此，当前的高龄老人绝大部分在年轻时没有在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的就业经历，这也导致高龄老人更难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但近二十年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连续增长，早期的年增长率达到10%，近几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养老金待遇的增幅有所放缓，目前平均为3.8%左右。这使得少部分有资格领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高龄老人享受了养老金连年增长带来的红利，能够领取高额的养老金。基于上述原因，高龄老人的收入出现分化，进一步拉大了老年人的收入差距。针对这一局面，政府实施了高龄补贴政策，对年满80岁的老人给予补贴，有些地方的政策更为慷慨，也对年龄更低的老人给予补贴，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老年人因为年龄差异导致的收入差距。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3994.7万老年人享受老年人补贴，其中享受高龄补贴的老年人3246.6万，全国共支出老年福利资金386.2亿元，养老服务资金144.9亿元^⑥。

经过多年的扶贫攻坚，我国已经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相对贫困仍待解决，少数老弱病残群体无法靠自己赚取收入，需要外界的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是针对这一群体的重要帮扶措施。其中，那些患重病、残疾老人，无子女的孤寡老人，以及老年特困群体可以从这一政策中受益。因此，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也是调节老年人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低保对象454.9万户、737.8万人，全国城市低保平均保障标准每人每月711.4元；有农村低保对象1945.0万户、3474.5万人，全国农村低保平均保障标准每人每年6362.2元。全国共有农村特困人员437.3万人，全年支出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429.4亿元；全国共有城市特困人员32.8万人，全年支出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49.7亿元^⑦。

① 庞志、王晓妮、邢华彬：《试析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对老年群体收入差距的影响》，《上海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② 洪丽、尹康：《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减贫及再分配效应》，《社会保障研究》2021年第3期。

③ 周延、谭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基于老年群体收入差距变动视角》，《人口与发展》2021年第1期。

④ 贾晗睿、詹鹏、李实：《“多轨制”养老金体系的收入差距——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的发现》，《财政研究》2021年第3期。

⑤ Li J, Wang X, Xu J, Yuan C. The Role of Public Pensions in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Elderly Households in China 1988 - 2013.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61.

⑥ 民政部：《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8月26日。

⑦ 民政部：《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8月26日。

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在内的社会救济缓解了贫困,但由于受众有限,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较弱^{①②}。不过,由于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保障,收入再分配只是派生功能。因此,应对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有恰当的定位,不能脱离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政策目标^③。

(三) 社会支持与老年人的收入差距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④”第三次分配是社会各个主体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募集、捐赠、志愿等慈善公益方式自愿进行的收入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对于促进共同富裕是一个很好的途径。目前,第三次分配尚处在起步阶段,截至2021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捐赠收入1192.5亿元,比上年增长12.6%^⑤。

尽管我国的各项捐助和慈善活动日益高涨,但与我国整体的经济规模还不相匹配,原因主要在于一些基本的激励体系和保障制度尚未得到很好完善,需要进一步完善捐赠的税收激励机制,畅通捐赠渠道,弘扬慈善文化^⑥。同时,当前的第三次分配制度仍然缺乏针对老年人的特别安排,建立起面向老年人捐助和慈善活动的激励体系和保障制度,使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老年人从三次分配中受益,从而调节老年人的收入差距,仍然是我们推动老年人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调节老年人收入差距的制度创新

(一) 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积累

由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积累较少,而且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其他省份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也仅有100—200元/月。因此,如果那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老人仅仅依赖养老金生活,其生活将无法得到保证。

随着政府在激励参保方面的努力,越来越多的未能被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的人开始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些无法达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参保者也可以便利地把个人账户资金转移到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那么当他们年满60岁时,将有更多的个人账户积累,届时,他们的养老金待遇也随之提升。因此,需要进一步引导那些无法被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的人,积极参加居民养老保险,提升缴费档次,打通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账户的资金转移渠道,从而做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提高参保者年老后的养老金待遇。

(二) 实施遗属养老金政策

由于在养老金方面的性别收入差距,丧偶老年女性失去了分享配偶养老金的机会,在配偶去世

① 李实、杨穗:《中国城市低保政策对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作用》,《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5期。

② 蔡萌、岳希明:《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1期。

③ 何文炯:《我国现行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的机理分析及效应提升》,《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5期。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⑤ 民政部:《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8月26日。

⑥ 管筱璞:《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煜》,《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年8月20日。

后获得的经济来源可能变少,因而丧偶也促使老年人性别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父母越来越注意子女的成长质量,很多女性在生育子女后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未来养老金方面的性别差距可能更为突出。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设计了遗属养老金制度,以便那些自己没有资格领取职业养老金或者养老金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可以在配偶逝世后继续得到来自社会保障计划的支持,避免生活水平的下降。例如,在美国,对于一个达到完全退休年龄才退休的老年男性和一个因从未工作而没有资格享受退休金的老年女性组成的家庭,当丈夫逝世后,妻子依然可以继续按100%的比例领取配偶的养老金^①。

遗属养老金制度的实施有效地保障了丧偶老年女性的生活。随着遗属养老金制度的调整,受益于该项政策的美国丧偶老年女性的贫困发生率逐渐下降,丧偶老年女性的贫困发生率已经同全国的贫困发生率持平^②。因此,这项政策将有助于缩小老年丧偶群体和未丧偶群体,以及老年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为调节老年人收入差距做出积极贡献。

(三) 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由于法定退休年龄的限制,那些在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就业的人到达退休年龄后退休,并开始领取城镇职工养老金。而其他的老人,主要来自农村,往往从事家庭农业经营活动,或从事灵活就业的工作。他们没有在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后领取待遇较高的职工养老金的资格,很多人会在年老后一直工作,直到干不动为止。其中,对于农业户口的男性,在60—64岁阶段,有接近80%的人在在工作,而到80岁以上,仍有20%在工作;对于农业户口的女性,在60—64岁阶段,就业率接近70%,而超过80岁,也仍有10%在工作^③。这些人在老年后依然从事赚取收入的工作,弥补了他们养老金的不足,缩小了收入差距。

因此,鉴于部分低龄老人、特别是农村低龄老人还有很强的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应当鼓励这部分即将迈入老年和刚刚迈入老年的人继续就业。这一方面符合老龄社会开发老龄人口人力资源的政策,另一方面对于部分经济基础薄弱的老年人,也能得到生活上的保障。政策上,需要进一步考察低龄老人的就业潜力,提出针对低龄老人“鼓励劳动”为核心的正向激励机制,探索对低收入就业老人的现金转移支付政策,促进低龄老人就业,缩小收入差距。

(四) 依靠农村集体经济收入赡养低收入老年人

低收入老人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当前,农村地区大力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能够助推乡村振兴;另一方面,有助于村集体和村组织获得收益,积累资金,从而有能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尽管目前已经全面实现脱贫,但脱贫人口仍存在返贫风险。通过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可以作为政策兜底,对本村的困难人口,特别是困难老年人给予帮扶,作为政府救助政策的一个补充,也有助于缩小老年人的收入差距。因此,需要探索农村低收入老年人从村集体经济的收益中获得分红的制度,从而依靠农村集体经济保障农村低收入老年人的生活,缩小收入差距。

① Hofer V. How Own Income Affects Net Income Loss after the Death of a Spouse? (July 23, 2013).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842525>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842525>.

② Weaver D A. Widows and Social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2010,70(3).

③ 赵耀辉、王亚峰、陈欣欣、刘雪媛、汤焱、张涛、侯杜比、梁超、孟琴琴、宋泽、张晓敏、毛尚熠、薄海:《中国健康与养老报告》,2019年5月。

五、结语

中国的老龄化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老年人的养老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经济上，老年人越来越依赖自己的收入养老，共享家庭成员收入的作用减弱，如何调动家庭、政府和社会的作用，建立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体系，是保障老年人经济福利、推动老年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为此，本文讨论了家庭、政府和社会支持在调节我国老年人收入差距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及相互影响，揭示了针对老年人的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制度的作用机制。政策上，调节老年人的收入差距需要尊重国情、量力而行、着眼未来，力求充分调动个人和社会的力量，促进低收入老年群体增收，扩大中等收入老年人规模。这里基于家庭、政府和社会经济支持的现有效果，在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背景下，从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积累、实施遗属养老金政策、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依靠农村集体经济收入赡养低收入老年人等角度提出调节老年人的收入差距的制度创新策略。

一个可以纳入考虑的深入改革是统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特别是在当前加强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充力度的背景下，需要确保来自中央财政的补助能够公平地让不同项目的参保者受益。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从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分析，无论是个人的劳动收入，还是家庭、政府和社会的经济支持，这些收入之间存在“挤出效应”。老年人养老金的增加或者收到其他政府转移支付，会减少收到的私人转移收入和劳动收入，也会影响养老安排。这一现象在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往往被忽视，也会影响调节老年人收入差距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在调节老年人收入差距的政策分析中，需要对其中存在的“挤出效应”予以重视。

An Analysis of Adjustment Mechanisms for Income Disparities am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ZHAO Rui LU Erlin MAO Shangyi

[Abstract] Promot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older adults i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in the new developmental stage. Mobilizing the powers of families,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o explore pathways for Reducing income disparities among older adults is crucial for achiev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the role of family economic support in Reducing income disparities among older adults,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income sharing between spouses, income sharing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economic transfers with non-cohabiting relatives. Furthermore, it discusses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government and societal economic support, such as public pension systems,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social donations, contribute to Reduce income disparities among older adults through secondary and tertiary redistributions. Finally, the paper advances innovative institutional strategies to address income inequalities among older adults. These strategies encompass augmenting the accumulation of individual accounts within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mplementing survivor pension policies, developing the human resources of older adults, and relying on rural collection economic income to support low-income order adults.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Older Adults; Income Disparities

（责任编辑：朱瑞 责任校对：冯贺霞）